

自致努力与教育获得、职业成就的关联

——基于路径模型的实证分析

秦广强

内容摘要:教育与职业成就获得的重要研究议题在于评估先赋背景与自致努力二者的作用权重及其机制。布劳—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将教育等人力资本视为自致性因素,作为与家庭背景相对应的解释变量,其问题在于,教育本身是一个具有内生性的中介变量,而真正的自致努力因素却被忽视了。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在既有路径模型中加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等自致因素,构建更符合逻辑的地位获得模型。研究表明,自致努力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个体的地位和成就变量(教育、职业、收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在由先赋和自致两方面因素构成的总体影响效应中,自致努力占到了20%—30%的比重。不同世代群体的际遇尤其是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其自致努力的效应也存在异质性,从“50后”至“80后”,努力的效应总体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透露出值得警惕的阶层固化信号。

关键词:自致努力;地位获得模型;教育成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一、引言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引起全球学界轰动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加剧且处于持续恶化之中,经济的制高点不只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据此他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皮凯蒂,2014)。这一说法表明,家庭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不仅由劳

作者简介:秦广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流动。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8年度科研项目“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调查”以及中央民族大学2020年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分层与流动”(项目编号:KC2006)的阶段性成果。

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国内社会近年来也在热议“寒门能否再出贵子”“阶层是否已固化”等议题,这些话语的流行本身就反映出人们对于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不足的疑虑与担忧。阶层是否已固化,或者说在已经固化的社会结构空间中,自致努力对于地位获得还能起多大的作用?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

长期以来,社会流动研究的学者们主要的兴趣在于辨别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个体成就获得中分别起多大作用的问题。相应地,也会形成两种社会不平等的形式:由环境因素和先赋背景导致的“机会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以及由自致性努力不同而形成的“努力不平等”(inequality of effort)(Marrero & Rodriguez, 2013)。显然,先赋予自致两种因素在个体成就获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及其变迁,既决定着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地位流动机制,也是宏观层面衡量社会空间开放性和机会结构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然而,在以往的地位获得研究中,个体自致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误读了。例如,“新结构主义”范式强调阶级、经济部门和工作组织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Kalleberg & Sorenson, 1979),忽略了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将教育等人力资本视为与家庭背景相对应的自致性因素,放置到对子代地位获得的解释中。但实际上,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自致性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父代与子代地位之间的传承和中介作用(出身通过教育而影响职业地位),而真正的自致性努力因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却并没有得到检验。

由此,本文在学理意义上承继传统的地位获得研究,将自致性努力这一重要的外生性因素纳入成就决定的解释中,构建更加符合逻辑的地位获得分析框架。这样既可以在学理上评估先赋和自致因素的相对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也可以在经验上回应社会舆论广泛热议的“阶层固化”的话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放置到不同社会世代上,以评估努力之于地位获得的群体异质性和时代演变性。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经典的地位获得研究及其局限

在地位获得研究中,布劳和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引领了一时的研

究风气(Ganzeboom, Treiman, Ultee, 1991)。他们以路径分析模型为工具,从微观层面探讨美国民众在职业方面的成就受其家庭背景和自身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有多大(Blau & Duncan, 1967)。他们将个人的地位获得视为在其生命周期中顺次出现的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据此建立了一个将先赋性因素(父代职业和教育)和自致性因素(子代教育和初职)、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同时纳入分析的路径模型。尽管地位获得模型是有关个体地位流动机制的微观分析,但其研究发现仍不乏宏观意涵:个体的职业成就越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后天自致性因素,则意味着社会结构开放性程度越高。他们的经验发现显示,对于代职业成就影响最大的,首推子代的教育程度,其次是其初职,父代职业地位排在第三。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二战”之后处于成熟工业化阶段的美国社会,人力资本等因素比先赋性因素在个体职业成就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布劳和邓肯之后,一大批研究者致力于对这一分析模型的改造或拓展工作,这其中又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是在对地位获得模型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即将个人特征属性之外的结构性因素(性别、种族、同期群、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体制和制度)加入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在“修补完善”的意义上发展衍生模型,如威斯康星模型,哈佛模型,赖特模型以及罗宾逊模型等(许嘉猷, 1986: 197-214)。

尽管经历了一些从结构性视角提出的质疑挑战和从社会心理视角进行的模型衍生扩展,布劳和邓肯仍然为地位获得研究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他们确立了一个微观视角的以家庭资源禀赋(父代职业和教育)和自致性努力(子代教育)二元驱动的理论模型。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讨论和拓展的问题。

第一,子代教育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和先赋家庭背景相对等的自致性努力因素,而是一个处于父代与子代地位之间、起到传承和中介作用的变量。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之所以成立,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即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而家庭背景因素在子代教育获得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Treiman, 1970)。实际上,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扮演双重角色,它既是下层向上实现地位流动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或再生产的工具(布尔迪约、帕斯隆, 2002)。优势群体可以利用各种资源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保证其子女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而劣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则因教育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无法向上流动的底层。尤其是在当下,教育越来越难以扮演“社会平等的调节器”角色,而日益沦为“社会阶层分化器”(王悠然,2018)。因此,子代教育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外生性自致因素,而是一个同时受到家庭背景、个人能力、努力等因素影响的内生变量,一个处于家庭背景、个体努力和最终地位之间的中介变量。

第二,传统的地位获得模型只是检验了家庭背景这一解释变量以及教育中介变量的效应,而理论上承诺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自致努力的效应及其中介机制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和检验。统计技术层面子代教育作为内生变量所造成的估计偏误可以通过工具变量方式来分解和降低,但将子代教育代替子代努力作为自致性因素纳入模型,则存在严重的设计和逻辑谬误。即使使用各种工具变量来应对教育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地位获得模型仍然存在与其理论承诺(先赋予自致)不相符的遗漏变量的问题。

第三,在布劳—邓肯之后有研究加入个体心理因素和外在结构性因素,但这些仍无法充分解释个体地位获得的异质性。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即使是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工作岗位等条件相同的人,其社会经济成就仍存在差异。这样的社会分化并非仅由客观结构位置、家庭背景等因素造成,个体努力等主观能动因素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并且,自致努力是一个重要的外生性变量,尽管个体的认知和努力程度是在一定的环境和结构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个体的主观认知和行为付出又是个体自身能够选择和控制的(龚锋等,2017)。例如,在身处逆境时有人奋勇拼搏、砥砺前行,但同样也有人消沉颓废、自暴自弃,对处于优越条件和顺境中的个体而言,同样会有人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与表现。

第四,威斯康星模型因在布劳—邓肯模型基础上加入个体认知和动机层面的心理因素而闻名(Swell et al., 1969),但诸如重要他人影响、教育与职业期望等变量是作为中介因素纳入地位获得分析之中,并且这些心理因素只是构成了一种行为预期和倾向的潜在动力,而行为结果的出现或目标的达成,不仅需要潜在动因,还需要有实在的行动付出,比如在学业上刻苦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奋力打拼。这些自致努力因素与先赋背景一道共同作用于人们的地位获得。

(二) 自致努力的意义和价值

努力涉及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尤其是“主体能动性”发挥这一基本问题,它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标和结果而致力于调用自己身心能量的过程(徐光国、张庆林,1996)。在人与外在世界的主客体相互关系中,自致努力因展现出个体主动、主导和积极能动的性质,使得“世界因主体而变化”(Segeber,1985:161)。从地位获得的角度而言,社会成就和地位分化并非仅由结构和先赋背景要素决定,个体的自致努力和主观能动同样重要。集中体现为自主、自为和创造性的自致努力(仇赛飞,2001),不仅代表着行动的意图,更体现为行动的能力。

自致努力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一是努力进取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影响个体的认知。相当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努力型人格与自我效能感、成就归因等个体认知因素均有密切关联(Harter & Connell, 1984; Bandura, 1989)。具备努力型人格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能力知觉,他们可以长期保持对自己行动潜能的信心和目标追求的乐观心态;二是努力进取能够激活个体的潜在能力,提升人力资本效用。教育、技能、经验等代表着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表现为完成工作和任务的能力条件,而努力代表着人们愿意为工作付出的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及能力条件作用效度的空间;三是努力型人格影响个体的情景应对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具备努力型人格的个体,不仅持有积极的认知和信念,还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聚集于调动所拥有的身心和社会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面对无法摆脱的束缚、困难甚至挫折,仍能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体现出对于困难应对和问题解决的坚韧性,从而这些个体展现出更强的社会环境适应性。正所谓“生命不息,努力不止”,具备努力型人格的个体通过调节内在认知和强化外在行为的方式获得更好表现和更高成就。

目前,有不少研究借助布迪厄(Bourdieu, 1984)所提出的惯习、文化资本理论以及鲍姆里德(Baumrind, 1971)、拉鲁(Lareau, 2002)等人所提出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指出作为由父母向子女传递的一系列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的教养方式,在社会群体中存在差异且作用于地位再生产。由此一种合适的推论认为,自致努力作为一种非认知能力,受家庭出身和父母教养观念的影响,因而很难被视为一种外生变量。对此,我们的考量在于:

第一,理论上,布迪厄所讲的资本代表着外在的约束性条件,而惯习则是内在性情系统,性情惯习并不是简单地由客观地位和各类资本直接决定,在理论分析层面应注重做出区分(洪岩璧、赵延东,2014):有些性情和惯习深受结构地位和资本的调节形塑,比如在经验操作层面使用较多的孩子或父母参与高级文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或听音乐会),还有延展到阅读习惯与文学环境、课外活动等方面,很多学者将其称之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并且相当多的经验研究表明,这些文化资本指标都对子代的学业成功和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Jaeger, 2011);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个体的性情惯习,并不直接受家庭地位和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的影响,比如个体的效能感、进取心、创造性等非认知能力。自致努力尽管内嵌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条件和家庭环境,但更多作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内在体验和积极建构,很大程度上其所展示的观念与行动不受家庭环境的直接形塑。例如,同样身处逆境或顺境之中,都有人奋力拼搏,也有人颓废懈怠。而且,布迪厄也指出,性情惯习与客观地位之间很可能存在错位现象,尤其是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个人在过往经验中形成的性情可能不符合当前境况,从而呈现出错位的“滞后效应”(Bourdieu, 1990:60-62)。迪马济奥(DiMaggio, 1982)所提出的著名的文化流动模型(cultural mobility model)也指出,在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中,童年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文化资本存量的影响甚微,获取积极向上的优势地位文化(prestigious status cultures)对低地位群体而言是有效的地位获得和向上流动途径。

第二,经验上,即使自致努力被视为是一种受到家庭背景影响的教养方式和教养理念,它也并不必然存在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有不少研究得出这样的发现。例如,洪岩璧、赵延东(2014)结合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子代教育上,中产阶级父母在资本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惯习和理念上却和底层阶级父母无甚差别。当前中国的阶级差异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占有的差异,中产阶级并未在阶级惯习上显著区别于底层阶级,不同阶层尚未在内在性情上呈现明显区隔;另外,田丰、静永超新近的一项研究(2018)也指出,中国城市家长在养育观尤其是对孩子自主性的培养上不具有阶层差异。庞雪玲(Pong et al., 2010)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高学历的家长中,相对于美国的欧裔家长,美国的亚裔家长与台湾的家长的养育观更为相似,家庭教养更多地可以被看作是儒家文化的延伸,

即家庭都倾向于向下一代传递儒家文化规范,教孩子“学做人”和“努力上进”,以期其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

总之,我们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上,家庭背景与自致努力之间都不存在确切的因果决定性关联。尽管个体的自致努力是在一定的环境和结构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它和结构环境之间又有相对的边界,当前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显著且难以逾越的阶级间惯习区隔,自致努力仍然是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选择和控制的,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它是作为外生变量而非中介变量直接纳入模型。自致努力典型地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它既作为一种心理认知和行为预期因素,构成积极行为倾向的潜在动因,同时也包含面向目标能动地调用条件资源的实际行为付出。作为一种可贵的人格特质与实践动因,自致努力具有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功能。

(三)中国的社会变迁、制度转型与地位获得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外部环境对不同世代群体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很大差异。换言之,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的作用机制及其限度也受到制约。因此,对于个体地位获得决定机制的考察,尤其是自致努力的效应问题,需要放置在更为宏观的社会时期和制度环境中展开(李春玲,2003)。在此,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年)、改革初期(1979-1992年)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年以来)三个典型时期入手(李春玲,2003;李煜,2009),探讨影响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模式的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动,从中也可以看出自致努力效应随之发生的变化。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家根据发展战略需要和意识形态考虑在不同地区、部门和组织间有差别地分配资源和机会,社会成员间形成了以政治和制度身份为特征的各种结构性差别(李强,1997)。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彻底的社会改造,形成了一个“去分层化”的社会(Parish,1984),阶层间差异和不平等大大降低,而代际地位的继承也被直接削弱。国家政策直接干预的做法在“文革”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Deng & Treiman,1997)。教育领域的干预表现为,普及基础教育以快速提高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减免各级教育

学费,尤其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采取配额方式优先录取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子弟,同时歧视和排斥资产阶级或专业人员家庭出身的人(Parkin, 1971)。由此,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普通工农的后代反而获得更多机会。此外,国家政策在就业和工作分配、职业晋升、精英吸纳等方面也对工农阶级的子弟予以额外照顾和庇护,家庭出身的“根正苗红”成为精英筛选的重要条件,使得底层家庭出生的子代流动机会大幅提高。

改革初期(1979-1992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和社会活力被极大激发,“市场地位”逐步取代改革之前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地位”,成为决定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也由改革之前的体制性因素转变为市场性因素(李路路、朱斌,2015)。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国家政策都不再对工农子弟进行照顾和倾斜,“重知识、看表现”的绩效主义原则在教育机会和精英职业筛选上盛行开来。教育机会分配上,在新恢复的高考这一“指挥棒”下,整个教育系统盛行绩效原则,家庭背景对于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显著增加,教育不平等程度相对于改革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李煜,2006)。职业地位获得上,一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晋升筛选机制发生变化,良好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成为就业的前提条件;二是市场化和工业化带来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巨大变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以管理人员、专业和技术人员为主体的非体力劳动职位大幅增加。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大部分社会成员从中受益,尤其是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子弟获得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当然,这一时期体制排斥的效应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例如,户籍制度仍在严格执行,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仍存在着封闭性(李路路,2002)。

改革进入深化期之后(1993年以来),市场机制越来越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就教育机会而言,教育产业受到市场化的明显冲击和影响,教育成本上升,教学主体多元且质量差距拉开,与此同时社会群体加速分化,此阶段教育不平等的主导逻辑体现为资源转换模式,即家庭资源(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比以往更容易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李煜,2006),家庭背景与子代教育之间的关联比上一时期更加紧密,教育再生产趋势加剧。职业地位获得上,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的发展,使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身份和制度障碍进一步清除,自由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很多研究表明,父子职业地位间的继承性关系被打破,代之以教育为中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但另外

一方面,随着市场排斥取代体制排斥,阶层结构趋于稳定,优势阶层逐渐学会娴熟地运用市场机制达到阶层再生产的目的(李路路、朱斌,2015),从而带来阶层固化隐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之前无论是教育机会还是职业获得,家庭背景的影响均被政策干预冲击到最小,代际地位的继承性被直接削弱,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等自致因素之于成就获得能够有较大的作用空间;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程度上升,教育获得过程中先赋因素作用增强,努力学习的作用效应可能会随之有所收缩;而市场化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职位扩张、社会结构调整以及相伴随的绩效主义原则盛行,为职业地位流动提供了广阔空间,家庭背景的束缚减弱,个体能力、努力等自致性因素影响提升;改革进入深入期,文化再生产和资源转换模式同时成为教育不平等的决定逻辑,教育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而随着优势阶层学会熟练地运用市场或体制排斥机制来实现阶层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空间存在固化倾向,自致努力效应的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

与上述三个典型时期相对应,我们采用世代划分的方法,通过对不同世代群体进行比较,来考察不同阶段和制度环境下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模式。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在于,相同世代的人群在接受教育、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取劳动报酬方面的时间差异不大,他们经历着基本相似的社会历史事件(张桂金等,2016)。本文根据子代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将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群体划分为4个典型世代:“50后”(1950-1959年出生)、“60后”(1960-1969年出生)、“70后”(1970-1979年出生)、“80后”(1980-1995年出生^①)。这既与社会上流行的代际群体划分的说法相吻合,也和前文论及的转型阶段相匹配。“50后”的教育与初职地位获得更多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年)展开,“60后”则稍显特别,有一部分人的教育与职业获得是在传统时期,另有一部分则在改革初期(1979-1992年);“70后”的地位获得更多是在改革初期,而“80后”的地位获得大

^① 在2016年这一调查时点上,相当一部分“90后”还处在学校教育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不多,考虑到样本量和两个世代成长环境的相似性,在操作上将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人群视为同一世代。

多是在改革深化期实现。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数据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①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主体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2016年调查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区),样本包含401个村居,14226户家庭,21086个个体,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在本文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年龄处于18-70岁的19811个社会经济活动人口样本作为分析对象。

(二)变量

1. 因变量

子代职业地位。目前对职业地位进行测量最常用的指标是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它集中体现了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且作为连续性变量能够很好地应用于路径模型分析之中。CLDS2016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当前或最近一份工作的职业状况,我们将其转换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以此来衡量被访者的职业地位。

子代经济收入。在布劳-邓肯的模型中,成就变量是职业地位,而在后来的诸多衍生模型中,成就变量中增加了经济收入。在此,我们也将个体经济收入纳入成就变量之中。CLDS2016问卷询问了被访者过去一年中的总收入状况(包括农业收入、工资收入、经营收入等),我们以此来衡量被访者的经济收入。

2. 解释变量

(1)先赋因素—家庭背景。与以往地位获得研究一致,我们以子代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来衡量家庭背景的影响,即先赋效应。父亲职业转换为ISEI值,父亲教育程度由转换之后的连续型变量“受教育年

^① 作者感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允许使用CLDS2016数据。

限”来衡量。

(2)自致因素一个体努力。对于自致性努力因素,我们通过两个维度来测量:一是努力学习。通过被访者14岁在校读书时的学习努力程度来衡量;二是努力工作的状况。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测量通过表1中所列量表来展开。我们根据被访者对该问题的打分来测量其努力状况,反映被访者后天自致性程度。我们计算了这两组指标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分别为0.828和0.780,这表明这两组提问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程度,以其来构建自致努力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1 自致努力变量的操作化

自致努力	原始题项
努力学习 (取三个问题得分的均值)	请回忆一下您14岁还在学校读书时(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情况,【如果那时您已经不读书,那就请回忆更早您还没有离开学校时】。您同不同意下面几点对您那时情况的说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四个等级)
	I2.8.1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
	I2.8.2 就算是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I2.8.3 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尽力去做
努力工作 (取三个问题得分的均值)	对下列说法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四个等级)
	I7.8.1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休息,我也会努力完成每日应该做的事(包括工作、学业及日常生活实务)
	I7.8.2 就算是不喜欢的事,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包括工作、学业及日常生活实务)
	I7.8.3 就算一件事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有结果,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

3. 中介变量—子代教育

前文已述,子代教育并非外生自致性因素,而是一个内生中介变量。在此,与父亲教育程度的操作化方式一致,我们使用子代的受教育年限这一连续变量加以测量。

(三)分析方法:路径模型

本文使用的估计方法是路径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子代职业地位(isei)和子代经济收入(income),外生解释变量为努力学习(effort_study)、努力工作(effort_work)和父亲职业地位(isei_father)、父亲教育程度(edu_father),内生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为子代教育程度(education)。该路径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如式(1)所示;因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路径如图1所示。

模型建构的基本考量在于：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是每个成员成就和地位获得的“基本要素”。自致努力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尽管个体的认知和努力程度是在一定的环境和结构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个体的主观认知和行为付出又是个体自身能够选择和控制的，家庭背景与自致努力之间存在交互而非因果决定的关系。另外，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其地位成就，也可以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变量这一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除了总体样本的分析，在后文不同世代群体地位获得模式比较上，我们使用多组比较结构方程模型(multiple-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进行估计。

$$education_i = \beta_0 + \beta_1 effort_study_i + \beta_2 edu_father_i + \beta_3 isei_father_i + \xi_i$$

$$isei_i = \delta_0 + \delta_1 education_i + \delta_2 effort_work_i + \delta_3 isei_father_i + \psi_i$$

$$income_i = \alpha_0 + \alpha_1 isei_i + \alpha_2 effort_work_i + \varepsilon_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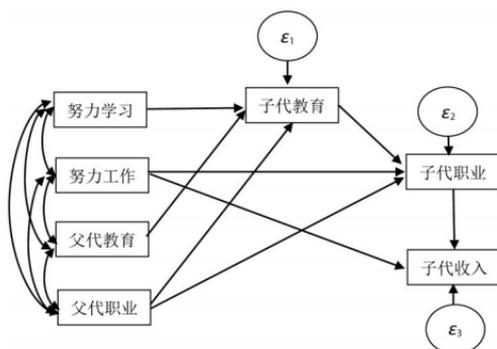


图1 自致努力、家庭背景影响地位获得的路径模型

四、经验分析结果

(一) 总体样本分析

本文选取18—70周岁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考虑到变量缺失值问题，在路径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完全信息参数估计即保留缺失值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同时，考虑到截面数据异方差的影响，估计时采用了稳健标准误。另外，路径回归系数报告的是标准回归系数。

图2展示了利用路径模型对总体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路径回归系数均具有很好的显著性(均在5%水平以上显著)，系数的方向和大小

也与既有研究和理论预期相符。模型总体的拟合优度(R^2)为0.29,自致努力和先赋背景变量共同解释了子代教育、职业、收入的25%、27%和6%的方差。

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到,父代教育、父代职业与子代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均不高,系数值在0.046—0.100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自致努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与能动倾向,受家庭出身和环境影响的程度不高,而是个体自身能够选择和控制的,我们将其视为外生变量直接纳入解释分析的策略得到了经验结果的支撑。另一方面,为了检视和应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行检验,通过匹配控制父代教育、父代职业、性别、户籍等混淆变量(即高努力组和低努力组在这些混淆变量上均没有差异),以获得自致努力对教育成就、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净效应。结果显示,无论采用邻近匹配、半径匹配还是核心匹配方法,自致努力的平均处理效应都是统计显著的。^①

子代教育获得上,父代教育的路径系数为0.440,父代职业的路径系数为0.063,前者的影响效应远高于后者,这与以往地位获得模型的结果有所不同。原因可能在于,父代职业的影响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父代教育体现出来。在自致努力因素上,子代努力学习的系数达到了0.12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从比值来看,在先赋和自致因素二者对教育获得的总体影响效应中,努力学习的贡献占到了20%,努力学习对于个体学业表现和学业成就仍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子代职业地位获得上,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19,另外,父代职业和父代教育也分别通过子代教育从而对子代职业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努力工作对被访者职业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043,虽然影响程度不高,但这种效应却是直接且显著正向的;另外努力学习也通过教育成就这一中介变量而对职业地位产生影响。

子代经济收入方面,个体职业对其经济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达到了0.240。父代教育和职业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更多通过间接路径实现,即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和子代职业从而对其经济收入发挥效应;自致努力因素上,努力学习对收入的影响通过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这一间接路径实现,而努力工作对被访者的经济收入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影响被访

① 考虑到文章篇幅,我们没有列出倾向值匹配分析的过程及结果,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者的职业地位而对其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直接效应是正向的且统计显著，但路径系数仅为0.019，表明努力工作虽对个体收入有积极作用，但总体影响程度不高。对此我们认为，个体经济收入可能更多受制于职业和部门等结构因素，个体能动性的发挥能带来积极收益，但这种收益相对于职业本身而言并不特别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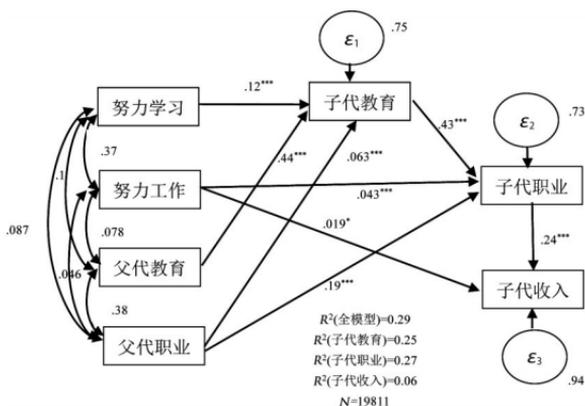


图2 路径模型估计结果(全体样本)

注:1. 参数估计方法为MLMV、robust标准误;2. 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3. 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进一步地，我们检验几条间接影响路径的统计显著性问题，并对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对于成就变量的效应进行分解。间接效应的检验上，我们首先将对应的两个直接效应相乘，计算出这些间接效应的具体系数并对间接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表2结果显示，父亲教育和职业通过子代教育对子代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父亲教育-子代教育-子代职业”这条间接路径影响程度较大(系数较高，为0.189)之外，其他间接效应系数均不高，均低于直接效应。自致努力方面，“努力学习-教育-职业”以及“努力工作-职业-收入”“努力学习-教育-职业-收入”这几条间接路径均统计显著。由此可见，自致努力因素对子代成就既有直接的促进效应，同时也通过间接路径发挥效用。这表明，努力作为一种可贵的人格特质，对于个体提升社会地位具有稳定且持续的影响。

从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的效应分解来看，教育成就获得上，自致努力(主要为努力学习)的影响系数为0.124，而先赋背景的总影响效应为0.505，

在二者的总体效应中,自致努力因素的比例占到了20%。在子代职业地位上,这一比例为19%,而在经济收入上,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30%。尽管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家庭背景的作用在三个成就变量上均大于子代自致努力因素,但个体努力的积极效应仍相当可观,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成就。

自致努力对于个体地位获得的显著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被直接忽略掉了。已有研究实际上只检验了先赋背景这一个解释变量,以及教育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而理论上宣称的与先赋背景相对标的后天自致努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检验。本文的数据结果表明,自致努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生变量,将其视为与先赋背景因素相对标的解释变量,不仅在理论上对既有的地位决定机制形成了有效拓展,也在经验上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撑。

表2 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其效应分解

影响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效应分解
教育成就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	0.124***		自致努力=0.124 先赋背景=0.505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	0.445***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	0.060***		
职业地位			
努力工作→职业地位	0.042***		自致努力=0.095 先赋背景=0.406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053***	
父亲职业→职业地位	0.20***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026***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189***	
经济收入			
努力工作→经济收入	0.019*		自致努力=0.042 先赋背景=0.098
努力工作→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10***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13***	
父亲职业→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46***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06***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46***	

注:1.路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2.显著性水平:*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二)不同世代群体差异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和制度环境中,微观层面的地位决定机制存在异质性。对地位获得模型尤其是先赋和自致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动问题的探讨,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时期并通过制度和结构分析来加以把握。如前文所述,我们根据子代受访者的出生年份将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群体划分为4个典型世代:“50后”(1950—1959年出生)、“60后”(1960—1969年出生)、“70后”(1970—1979年出生)、“80后”(1980—1995年出生^①)。这既与社会上流行的代际群体划分的说法相吻合,也和前文论及的转型阶段相匹配。

表3报告了多组比较模型的标准化系数,结果显示,前文总体样本分析的结论在不同世代群体身上也基本成立,即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因素对个体的教育、职业和收入均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方式表现出来。对自致努力因素来说,除了努力工作对经济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在“70后”和“80后”群体中已不再显著之外,其他努力因素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不同代际人群中,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对于地位提升和成就获得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重点对不同世代群体地位和成就获得机制的差异性展开分析,表3最后一列展示了四个世代群体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Tests for group invariance of parameters)^②。简便起见,我们将影响效应分解为先赋背景(父亲职业和教育)和自致努力(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两部分,图3描绘了不同世代群体在教育成就、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两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

表3 不同代际人群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分解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Wald Test)
教育成就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	0.200***	0.176***	0.152***	0.098***	chi2(3)=13.02 p=0.004

①在2016年这一调查时点上,相当一部分“90后”还处在学校教育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不多,考虑到样本量和两个世代成长环境的相似性,在操作上将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人群视为同一世代。

②分组结果中的群体差异比较在现有STATA统计技术上可以实现直接效应的组间显著性检验,但对于涉及多条路径的间接效应的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暂时还无法实现。

(续表3)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Wald Test)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	0.282***	0.330***	0.399***	0.433***	chi2(3)=37.94 p=0.000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	0.094***	0.078***	0.080***	0.114***	chi2(3)=4.71 p=0.195
职业地位					
努力工作->职业地位	0.054***	0.056***	0.039**	0.038**	chi2(3)=6.14 p=0.104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058***	0.064***	0.069***	0.043***	
父亲职业->职业地位	0.298***	0.207***	0.150***	0.133***	chi2(3)=33.81 p=0.000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027***	0.028***	0.036***	0.049***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职业地位	0.082***	0.120***	0.181***	0.189***	
经济收入					
努力工作->经济收入	0.051***	0.028*	0.008	0.007	chi2(3)=7.90 p=0.048
努力工作->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13***	0.012***	0.008**	0.006**	
努力学习->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14***	0.015***	0.014***	0.007***	
父亲职业->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72***	0.048***	0.030***	0.019***	
父亲职业->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07***	0.006***	0.007***	0.008***	
父亲教育->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经济收入	0.020***	0.027***	0.036***	0.032***	

注:1.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2.显著性水平:*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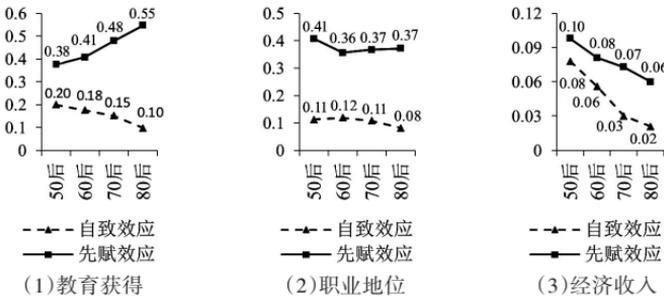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世代群体成就获得中自致和先赋因素的效应分解

教育成就上,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二者的效应此消

彼长,前者稳步提升,而后者在逐步减低。近几十年来,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趋势越来越突出,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学习能够提升教育成就的幅度越来越小。这一结果与既有教育不平等研究的结果相吻合(李煜,2006)。“50后”的教育阶段主要发生在1960—19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政治挂帅”的激进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先赋背景效应仅为0.38),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普通工农的后代反而获得更多机会,他们努力学习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及之后,绩效主义原则重新成为教育筛选的核心原则,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于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显著增加。

职业地位获得上,先赋背景因素的影响效应在“50后”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在之后的几个世代这一效应有所下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上,而其中“70后”和“80后”的代际继承性相较于“60后”又有所抬升。与之相比,自致努力因素在四个世代群体中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对于上述先赋和自致效应两方面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工业化和市场转型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迫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二、三产业以及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社会结构空间的开放性及其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的转移,一定程度破坏了父代和子代之间的传承模式,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降低,而自致努力和人力资本的效用提升。从中可以看出“60后”在市场化浪潮中获益最多,而到了“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之际,随着社会优势阶层学会利用市场排斥机制实现阶层再生产,地位获得的继承性有所抬头,家庭背景的影响提升而自致性努力的作用效应明显降低。

经济收入上,不同世代群体中先赋背景和自致努力的影响效应均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效应大多由间接影响所致。群体差异上,无论是先赋还是自致效应,均呈现出不断减弱的趋势。这一结果也不难理解,经济收入越来越受到个体教育程度和职业本身的影响,即使家庭背景起作用,也只是通过影响子代教育和职业产生间接影响。另外,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获取更高经济回报的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对教育、职业获得的间接影响,自致努力对于经济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对个体的收入有更强的制约性作用。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收入上体现的各世代群体自致性因素影响越来越弱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世代效应,也混合了年龄的作用,较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其自致努力的时间付出更

少,那么其影响也可能随之减弱。关于世代和年龄的混合效应,期待后续能展开更深入细致的探讨。

五、小结与讨论

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区分和辨别先赋背景与自致努力在个体成就获得中各自权重的问题。本文结合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在已有路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自致努力要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从而构建更加符合逻辑的地位获得模型。同时,我们也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放置到处于不同社会阶段和制度环境的群体(如不同世代)中,以评估努力之于成就和地位获得的群体异质性以及时代演进性。

主要研究发现概括如下:第一,自致努力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对个体的地位和成就变量产生显著且正向的影响。在由先赋和自致两方面因素构成的总体影响效应中,自致努力占到了20%—30%的比重。自致努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生变量,将其加入路径模型,不仅拓展了地位获得的解释路径与机制,同时也得到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撑。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研究中,应重视个体作为一个行动者的主体的能动性,拓展有关自致努力的分析维度。第二,不同世代群体的际遇尤其是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其自致努力对于成就和地位获得的效应也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教育成就上,从“50后”到“80后”,努力学习的效应呈逐步下降趋势,而家庭背景的效应不断上升。改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事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与子代教育的关联,而在改革之后的市场化进程中,教育获得的家庭再生产程度不断提升,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努力效应的削减。职业成就上,工业化进程和市场化转型削弱了子承父业的代际继承性,凸出了人力资本和自致努力的价值,“60后”受益最大,而到了“80后”群体身上,随着阶层结构趋于稳定,优势阶层逐渐学会娴熟地运用市场机制达到阶层再生产的目的,先赋背景又有所抬头,自致努力的效应明显降低,阶层固化现象已初露端倪。综上,本文对先赋和自致因素作用效应及演进趋势的描绘,揭示了中国社会开放性的变迁,分析结果暗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机会空间的开放性程度是有所下降的。

总之,自致努力典型地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它既作为一种

心理认知和行为预期因素,构成积极行为倾向的潜在动因,同时也包含面向目标能动地调用条件资源的实际行为付出。具备努力型人格特质的个体通过调节内在认知和强化外在行动的方式获得更好表现和更高成就。在现代社会中,“自致努力”的叙事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与勤奋工作、价值、效率、社会流动性、公平、个人责任等积极事物紧密相连。努力拼搏既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对个体发挥引领作用,也可以汇聚成一种崇尚拼搏、鼓励通过奋斗向上流动的群体信念和社会意识,从而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持久的影响力。在任何时期,努力的价值都值得肯定,努力的精神都值得提倡,即使是在当前阶层固化的时代,努力奋斗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

但另外一方面,当前代际继承性上升、阶层固化的信号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已固化”的现实舆论和民众隐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印证。数据结果显示,教育获得过程中家庭禀赋作用不断上升,“80后”职业地位的继承性相较于前两个世代也有所抬头,与之相应地,自致努力对于教育和职业地位的提升效应明显减弱,努力工作对于经济收入的作用在一些群体中已不再显著,这些都是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结构趋向固化的警惕性信号。因此,在肯定自致努力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不断推进“制度努力”,即通过制度调整和完善实现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进一步提升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机会空间的公平性,打破阶层壁垒,为中下层民众的上升流动提供更多通道。尤其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更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降低个体自致努力的起点差异,缓解这部分人群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经济约束,为个体努力上进提供更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 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龚锋、李智、雷欣,2017,《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经济研究》第3期。
- 洪岩璧、赵延东,2014,《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春玲,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李路路,2002,《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路路、朱斌,2015,《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李强,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煜, 2006,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煜, 2009, 《代际流动的模式: 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社会》第6期;
- 皮凯蒂, 2014,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仇赛飞, 2001, 《论人的主体性与主体性教育》, 《哲学动态》第2期。
- 田丰、静永超, 2018, 《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王悠然, 2018, 《教育在美国变成“阶层分化器”》, 《中国社会科学报》, 8月26日。
- 徐光国、张庆林, 1996, 《习得性勤奋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假设》, 《心理科学》第3期。
- 许嘉猷, 1986, 《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 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张桂金、张东、周文, 2016, 《多代流动效应: 来自中国的证据》, 《社会》第3期。
- Bandura, A. 1989. *Self-Regulation of Motivation and Action through Internal Standards and Goal System, Soul Concept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Pervin, J.,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4(1).
- Blau, P. M. & Otis O.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ng, Zhong & Donald J.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in the US High Schoo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2).
- Ganzeboom, Harry B. G., Donald J. Treiman & Wout Ultee. 1991.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1).
- Harter S, Connell J. 1984. "A Model of Children's Achievement and Related Self-Perception of Competence, Control,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3).
- Jaeger, M. M. 2011. "Does Cultural Capital Really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Combined Sibling and Panel Dat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4).
- Kalleberg, Arne L., & Aage B. Sorenson. 1979. "The Sociology of Labor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 351-379
- Kalleberg A. L. & Aage B. Sorenson. 1979. The Sociology of Labor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
-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b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 Marrero, G. A. & Juan G. Rodriguez, J. G. 2013.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
-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ocieties*. New York: Praeger.
- Pong, S. L., Jamie Johnston & Vivien & Chen. 2010.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Asian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4(1).
- Segerberg, K. 1985. Models for Action. In B. K. Matilal & J. L. Shaw.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idel: Dordrecht.

Sewell, William H., Archibald, O. Haller & Alejandro Portes. 1969.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34(1).

Treiman, D.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The Effect of Self-motivated Effor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th Model

QIN Guang-qiang

Abstract: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for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is to assess the respective weights of background and self-motivation. The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proposed by Blau-Duncan ascribed education to self-induced factors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relative to family background. The problem is that education itself is an induced mediating variable, while the real self-induced effort factor is overlooked. This paper uses the 2016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and adds self-induced effort elements (study hard and work hard) into the existing path model to build a more complete and logical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Studies show that self-motivated effort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status and achievement variables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ways, and self-motivated effort accounts for 20%–30% of the overall effect.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ere different, and the effects of their self-induced efforts also had obvious heterogeneity. The effects of the efforts of the “post-50” generation to “post-80” generation generally show a trend of fluctuation and decline, which reveals a warning class solidification signal.

Key words: self-motivated effort;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ccupational status; economic income

(责任编辑:朱斌)